

民国时期的调解体系及运作

罗金寿, 余 洋

(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 民国时期 国民政府整合传统调解资源 建立新型调解组织 形成了息讼会、区乡镇坊调解委员会、法院调解为核心的调解体系 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调解制度。但调解的实际作用 并没有达到制度设计者的预期。

关键词: 民国; 息讼会; 调解委员会; 法院调解; 实效

中图分类号: D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579(2016) 02 - 0149 - 08

The Mediation System and Its Oper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LUO Jinshou, YU Yang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ntegrated the traditional mediation system, established new mediation organizations, included the Withdrawing - law-suits Society, the Mediation Committee and the Mediation Department of Court, and set up the relatively complete mediation system. But the actual role of mediation didn't meet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system designer.

Key words: the Republic of China; Withdrawing - lawsuits Society; Mediation Committee; Mediation Department of Court; actual effect

民国时期,在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建立现代法院的同时,整合各种纠纷解决资源,形成了包括民间调解和司法调解在内的较为完备的调解机制。代表性的有息讼会、区乡镇坊调解委员会、法院民事调解处等组织及制度。

一、息讼会

民国初期,全国性的、大规模的民间调解组织尚未建立。传统的民间组织仍在断事评理、化解纠纷上发挥重要的作用。如江西各地方漕会、众会、祠会、宾兴会、清明会、茶山社、禾田社。^[1]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全国各地建立息讼会、息争会,以规范民间调解,整合各种调解资源。其中声势最为浩大,举办最力的是 1927 年阎锡山在山西推行的息讼会。

收稿日期: 2015 - 10 - 0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非常态司法——抗日战争对民国司法的影响”(编号: 11YJC820077)

作者简介: 罗金寿(1975 -),男,江西丰城人,法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 司法制度、民国司法史。

余 洋(1991 -),男,江西武宁人,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法理学硕士研究生。

(一) 息讼会的性质和任务

息讼会是主张公道、调解争执,以消灭诉讼为目的的自治机关。^[1]江西临川的《临川试办县政实验区息讼会暂行简章》第一条规定“本实验区为解除民众讼累,增进社会幸福起见,特设息讼会。”1930年12月河南镇平县建立息讼会,其目的是“消弭人民之讼端,减少人民之讼累,增进社会之幸福”。^[2] 1933年青岛市政府命令各村设立息讼会,其原由是“查乡区人民,知识浅薄,每因细故,酿起争端,缠讼不已,倾家荡产,本府为息事宁人起见,拟订简章,就户口繁多村庄,各令设息讼会一处,以资调解。”^[3]

(二) 息讼会的组织和人员

各地的息讼会组织结构和人员配置有所不同。

河南镇平县息讼会分为镇息讼会、区息讼会、总息讼会三级。乡镇息讼会由正、副镇长兼任公断员。区息讼会设公断员五人,公推三人,其余二人由区公所职员兼任。总息讼会由自治办公处聘请一人任办公室主任,二人为调解委员。^[2]

1932年建立的广西荔浦县的息讼会分为县区两级。县息讼会附设于县民团参议会内。区的息讼分会,设在当地的区民团内。县、区两级的息讼委员均为义务职。县息讼委员由县参议会、教育委员会、地方财政委员会、地方建设委员会的负责人为“当然委员”,另由县内务机关团体推选“公正士绅”两人作为委员;各委员互选常务委员一人办理会务。区息讼分会的委员设五人,以该区民团局长、副局长为“当然委员”,另由局长选聘“公正士绅”二人,局长兼任常务委员办理会务。^[4]

江西临川的息讼会将组织延伸至保,分保息讼会,区息讼会两种。《临川试办县政实验区息讼会暂行简章》第2条规定区息讼会设会长一人,由区长兼任,设公断员六人,公推四人,其余二人由区办公处职员兼充,保息讼会会长一人,由保长兼任,公断员六人,由副保长、妇女会正副会长兼任,其余公断员三人,选举地方公正人士担任。河北省各地只是在村、里公所附设息讼会,由村民中选举公断员五人或七人组成。^[5]山西的村息讼会设会长一人,公断员五至七人,会长由公断员互选产生。

(三) 息讼会的调解事件范围

各息讼会的调解范围各有差异。广西民政厅规定县息讼会的调解范围仅限于民事及小诉讼事件。从实践情况看,广西荔浦县息讼会调解的纠纷主要包括:夫妻反目意图离异、产业所有权纠纷、债务纠葛、系争祖业、损害名誉、继承纠纷、口角纠纷、葬山纠纷、佃耕欠租、买卖纠葛、婚姻纠纷等类别。其中夫妻反目意图离异、产业所有权纠纷、债务纠纷为多数。^[5] 河北的《村息讼会章程》规定“除命盗案外,凡两造争执事件,请求调处,均得公断之”。江西临川的息讼会章程没有具体规定息讼的调解范围。

(四) 息讼会的调解方式和程序

息讼会通常以人情公理断案,以劝息为原则,无强制执行权。在设有多级息讼会的地区,遇有纠纷先由基层的息讼会调解,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向上一级息讼会申请调解。调解达不成协议的当事人可向法院起诉。如河北《村息讼会章程》规定:公断后如有不服者,听其自由起诉。

为了保障公正调解,一些地方的息讼会章程对调解程序有较详细规定。第一,公断员断案必须立场公正、保持中立。《临川试办县政实验区息讼会暂行简章》规定“公断员应本良心主张,妥为调解,不能因亲疏恩怨,喜怒爱憎而为出入。”第二,公断员不得有受贿、私自会见当事人的行为。《临川试办县政实验区息讼会暂行简章》规定“公断员不得事前受当事馈赠,及事后一切酬报,违者依法处办。”“公断员不得于调解前,单独以私情与当事人谈话,当事人亦不得私行求见,违者予以惩处。”第三,有利害关系时,公断员应回避。河北的《村息讼会章程》规定“公断事件有涉及公断员本身及同居亲属者均应回避”。第四,处理案件公开进行。《临川试办县政实验区息讼会暂行简章》规定“本会调解事件,取公开主义,除有碍公共秩序,善良风俗,及其他应守秘密者外,一律任人旁听。”第五,规定处理案件的人员组成和决定方式。荔浦县息讼会(分会)调解纠纷时,必须有过半数的委员到场才能进行。河北《村息讼会章程》规定“公断时以公断员多数取决,同数取决于首席”。

随着国民政府基层政权建设的加强,各地息讼会,特别是村以上的息讼会被撤销,代之以调解委员会。1933年7—8月间,广西荔浦县的息讼会被撤销,1932年10月后,河南镇平县的息讼会被调解委员会代替。

二、调解委员会

1929年9月18日,民国政府公布施行《乡镇自治施行法》,同年10月2日公布施行《区自治施行法》。两部法律规定了乡、镇、区公所内附设调解委员会办理民事调解事项及依法撤回告诉的刑事调解事项。调解委员由乡民、镇民及区民大会选举产生,1931年4月3日,颁布实施的《区乡镇坊调解委员会权限规程》规定“各县之区乡镇及各市之坊所设调解委员会。各调解委员会受该管公所之监督,处理调解事务。”1943年10月9日,中华民国政府司法行政部会同内政部公布施行《乡镇调解委员会组织规程》。

经过中央政府的推动和地方的努力,各地相继建立调解委员会。如抗战时期,首都重庆市的调解委员会成立相对较多。1946年,重庆市18个区均成立调解委员会,其中5个区在金马寺、石板坡、菜园坝、宝善寺设有调解分会。1943年,璧山县有调解委员会35个,1947年该县各乡还成立有农事调解委员会。1946年,巴县青木、太平、广阳、歇马等29个乡,每乡有5—11名调解委员,全县共有调解委员202人。1949年,合川县的调解委员会达37个。^{[6] (p431-43)}

各省、县、乡镇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了地方性法规或办事细则。1935年,江西省通过《江西省各县区民事调解委员会简则》,在各县区署附设区民事调解委员会。1940年12月31日,江西省通过《江西省各县乡(镇)民调解委员会简则》。在各县乡(镇)公所均附设乡(镇)民调解委员会,在乡(镇)长监督之下,处理调解事务。1941年3月重庆巴县歇马乡公所制定了《乡调解委员会办事细则》。1944年,重庆永川县制定和执行《各区联保调解委员会规程》。

(一) 组织与人员

调解委员会附设于乡、镇、区公所内。如1944年实施的《重庆市各区区调解委员会规程》规定市辖区设区调解委员会,受区公所监督。区辖保设调解分会,县辖乡镇设调解委员会。

调解委员会设调解委员五至九人,设主席一人。调解委员由乡镇民代表会选举产生。在乡镇民代表会未成立前,乡镇镇务会议推举产生调解委员。调解委员推举产生调解委员会主席。调解委员会主席因故于开会不能出席时,可委托其他调解委员代理。调解委员任期一年,可以连选连任。调解委员会主席及委员都属无报酬职位。

乡镇内具有法律知识的公正人员可选任为调解委员。各地对于调解委员的资格有更具体规定。如1944年发布的《重庆市各区区调解委员会规程》规定调解委员的资格为:(1)年满25岁者;(2)品行端正、乡望素孚者;(3)略具法律知识者;(4)无不良嗜好者;(5)未丧失财产信用及未被处徒刑者。区长、区监察委员及乡、镇长及副乡、镇长不能够选举为调解委员。律师也不得当选为调解委员。^①

调解委员会由县政府和当地法院监管。调解委员会成立之日,乡镇公所须将调解组织情形,调解委员和主席的姓名、学历、家庭状况,分别报请县政府及当地法院备案。如调解委员违反《乡镇调解委员会组织规程》的规定或有其他违法行为,除请该管法院依法惩处外,由乡镇公所呈请县政府核准,先行停止其职务,并提经乡镇民代表会或乡镇务会议罢免。

(二) 调解事项范围

调解委员会调解民刑事调解事项。其中《乡镇调解委员会组织规程》对调解委员会调解的刑事事

^① 民政厅《函知解释乡镇调解委员会疑义(区公所律师公会)》的复函“据呈转请民政厅解释律师可否当选为乡镇调解委员一案,兹奉指令内开:查自治法令虽无律师不得被选为调解委员规定明文,惟参照民事调解法第四条第二项规定,现任律师,当然不得当选为调解委员。”陈德谦《现代分类公文程式大全》,大华书局,1935年6月版,第93页。

项进行列举式规定,具体包括以下各罪《刑法》(1935年实行的《中华民国刑法》,下同)规定的妨害婚姻及家庭罪、伤害罪、妨害自由罪、妨害名誉及信用罪、妨害秘密罪、窃盗罪、侵占罪、诈欺罪、毁弃损坏罪。

法院已经受理的民事事项,当事人已向法院告诉的刑事事项,调解委员会仍可以调解。民事事项如依民事诉讼法正在法院调解,则不得另行调解。

(三) 调解委员会的管辖

调解委员会对调解事项的管辖,以两造在同一乡镇为原则,但两造不在同一乡镇事项,除两造同意由任一乡镇之调解委员会调解外,民事事项由被告所在地,刑事事项由犯罪地的调解委员会调解。

(四) 调解声请和接受

调解委员会调解事项来自行政交办和当事人声请。如1930年4月7日,《河北省乡调解委员会章程》规定“其有县区交会调解者,调息后,立即呈明销案。如不服者,仍请县区核办。”当事人声请调解可以书面和口头方式进行。《乡镇调解委员会组织规程》第12条规定“当事人声请调解,得以书面或言词陈述其姓名、性别、住址、事由概要,并附送该事项之关系文件。由乡镇公所移送调解委员会予以调解。其以言词声请调解者,应由乡镇公所作成记录,移送调解委员会办理。”调解委员会接到当事人的调解声请后,经审查属于本调解委员会调解范围,调解委员会接受声请。

(五) 调解会议

自接受调解声请起,民事事项在10日内,刑事事项5日内,召开调解会议。民事事项当事人声请延期的可以延长10日。确定调解日期后,由乡镇公所通知当事人亲自到场。

调解委员会开会必须有过半数调解委员出席。调解委员对于调解事项涉及本身或其同居家属,应当回避。

调解遵循自愿原则。民事调解事项须经当事人同意,刑事调解事项须经被害人同意,才能进行调解。调解委员会不得有强迫调解及阻止告诉的各种行为。

调解委员会可评定赔偿,但无处罚权。《乡镇调解委员会组织规程》第18条规定“办理调解事项除对于民事当事人及刑事被害人得评定赔偿外,不得为财产上或身体上之处罚。”

如果调解成立,调解委员会根据双方当事人的意思,出具书面调解字据。调解委员会应将已调解成立的事项,详细列明当事人姓名、性别、年龄、住址及事由概要,调解成立年、月、日,由乡镇公所呈报县政府及该管法院备案。对于不能调解事项,也应当说明不能调解的原由,分报备案。

(六) 勘验

对于刑事调解事项,需要验伤及查勘的,由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辅佐人报请该管乡镇公所勘验,开单存查。如不愿勘验,听由当事人意愿。

(七) 费用

调解委员会办理调解事项时,除按实际支出收取当事人勘验费外,不得收取任何费用,不能收受报酬。调解委员会可以调用乡镇公所所属人员处理各项事务,因此产生的必要费用由乡镇公所负担。

三、法院调解

1929年12月,立法院拟具《民事调解条例草案原则》,确定七项原则。1929年12月14日,《民事调解法》修正通过,共计16条,1932年1月1日开始施行。1932年1月1日,司法院制定施行《民事调解法施行规则》。1934年将《民事调解法》的主要内容纳入《民事诉讼法》,废止《民事调解法》。

(一) 民事调解处

民国时期第一审法院包括地方法院及分院,地方庭及分庭,县法院。民事调解处附设于第一审法院,设调解主任,由法院推事担任。如法院推事不止一人,由法院长官于法院推事中遴选担任。如果民事调解处事务较多,可以派两名推事担任调解主任,二人独立行使其职务。

(二) 调解人

《民事调解法》规定调解人由当事人推举。如果一方当事人有多人,由该方当事人协商推举。1935年施行的《中华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不论当事人是否推举调解人,如法院认为有第三人适于协同调解,可以依职权选任为调解人。

《民事调解法》规定调解人应为年龄三十岁以上,有正常职业,识中国文的中华民国国民。褫夺公权者、禁治产者、受破产之宣告尚未复权者、现任司法法官或律师不得担任调解人。

开始调解前,调解主任依职权调查调解人是否符合资格。如发现调解人资格不符,或者有法定不得担任调解人情形的,不准许其协同调解,并告知或通知推举的当事人。如果当事人请求另行推举,酌定期限,让其另行推举。

调解人参加法院调解,可以在调解之时,或调解完毕10日内请求给予法定的报酬和差旅费。调解人所需差旅费,可以依据其请求,预先酌量给付。

(二) 调解事件范围

法院调解事件包括两类:一类是强制调解,《民事调解法》规定强制调解的事件包括:人事诉讼事件及初级管辖民事事件。1935年施行的《中华民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百零二条、第四百零九条对强制调解事件范围进行具体规定,其包括:标的金额或价额在二千元以下的财产权诉讼;出租人与承租人间,因接收房屋或迁让使用修缮,或因留置承租人之家具物品发生的诉讼;雇用人与受雇人间,因雇佣契约涉讼,其雇佣期间在一年以下的诉讼;旅客与旅馆主人、饮食店主人或运送人间,因食宿运送费或因寄存行李财物发生的诉讼;请求保护占有诉讼,不动产之界线或设置界标诉讼。但是下列情形除外:(1)为标的之法律关系,曾在法令所定之其他调解机关调解而未成立的。(2)因票据涉讼的。(3)提起反诉的。(4)送达于被告之传票,应于外国送达或为公示送达的。(5)依法律关系之性质,当事人之状况,或其他情事可认为调解显无成立之望的。但是,经法定调解机关调解未成立的,自法院或其他调解机关调解不成立时起,已经过一年的,在起诉前,应当再行调解。另一类是任意调解,包括经当事人声请,法院同意的其他民事诉讼事件。

(四) 调解程序

1. 调解启动。调解程序的启动有两种方式:一是声请调解。《民事调解法》规定当事人应书面声请调解。1935年《民事诉讼法》允许当事人以言词方式声请调解。二是移送调解。应先经调解的事件,当事人直接起诉的,由法院移送调解处办理。

2. 调解期日。如果不能即时调解,由调解主任确定调解期日。调解期日应在声请调解之日起10日内。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到场,可以处十元以下罚鍰。但当事人法定代理人或特别授权的代理人到场,以当事人到场论。1935年的《民事诉讼法》将罚鍰最高数额提至50元。

3. 调解形式。民事调解在法院附设的调解处进行。由调解主任及两名调解人进行调解。调解时,调解主任与书记官必须穿制服并坐。调解人分左右坐。^{[7] (p371)}调解期日,如当事人到场,调解人没有到场,或调解人不符合资格不许协同调解的,调解主任应当进行调解。

4. 调解方法。《民事调解法》及《民事诉讼法》没有具体规定调解的原则、方法。司法行政部的训令对法官如何调解有所要求。如1943年6月3日,司法部发布训民字第三零九八号训令。该令称:

首须离开裁判官立场,俨然以调解人自居,并于视听言动之中,处处表示息事宁人之意,务使当事人心悦诚服,乐于调解,复就其争议发生之原因及经过情形与当事人性行、境遇,暨彼此平日往来关系悉心考察体会,以求其症结之所在,公平处理且审时度势、因事制宜,随时晓以利害,示以方针。遇有争执渐趋激烈者,不妨命一造暂时退出,隔别开导。其偕有亲朋好友同来者,亦可许其到场,或在外从旁劝解。至以调解人先行调解为宜者,并得暂时退席,命其先为调解。总之,不惮烦劳,不惜辞费,以期于事有济,至诚所感,金石为开,自能多收调解成立之效。^{[9] (p165)}

5. 调解笔录。调解须制作调解笔录。调解笔录应当记载当事人姓名、年龄、住址、职业,调解的事实,调解结果,调解主任及调解人的姓名,调解处所和调解日期。调解笔录应当由当事人、调解主任、调解人签名。未经推举,或未到场或不允许协同调解的,调解主任与当事人在调解笔录上签名。如当事人或代理人未能签名,由法院书记官代签,由当事人或代理人按捺拇指印。

6. 调解成立及效力。《民事调解法》规定,调解主任向当事人说明调解笔录,双方当事人同意调解结果并签名,调解主任、调解人签名后调解成立。调解成立与法院确定判决有同等效力。

《民事调解法》规定,当事人无正当理由调解期不到场,经过五日,视为调解不成立。1935 年的《民事诉讼法》第 420 条规定“当事人两造或一造于期日不到场者,法院酌量情形,得视为调解不成立或另定调解期日。”

7. 调解与诉讼衔接。根据 1935 年的《中华民国民事诉讼法》第 419 条规定,调解不成立当事人可以起诉,也可以不起诉。如果双方当事人到场,调解不成立的,法院可以依据一方当事人的声请,决定立即进行诉讼辩论。但如果对方当事人声请延展期日,法院应当允许。以上情形,视为调解声请人自声请时已经起诉。

8. 调解费用。《民事调解法》第 423 条规定,调解不征收任何费用。1935 年的《中华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调解须收取费用。如果调解不成立后起诉,调解费用充抵诉讼费用;如果不起诉,则由声请人负担。

四、调解制度运行实效

息讼会、调解委员会、民事调解处是当时国民政府整合调解资源、对民间调解规范化、组织化的表现。相关研究发现息讼会、调解委员会、法院调解的实际作用,并没有达到制度设计者的预期。黄宗智认为华北农村“调解委员会或息讼委员会之类的机构,并没有认真建设。这类机构名称时髦,但未能扎根”。而且“顺义的案例和全国的司法统计表明法庭调解的实际影响很小”。^{[9](p360)} 实际情况是否如此,本文结合相关材料逐一分析。

(一) 息讼会状况

从个别地方的统计看,息讼会处理的纠纷数量不少,对于解决纠纷、减少讼累起着一定的作用。如广西荔浦县城厢八区息讼分会,从 1932 年 7 月到 1933 年 3 月 9 个月内,总计处理纠纷 977 件(见表 1)。当过河南镇平县法院副院长的郑建银回忆道“当时镇平县息讼会确实起到了弘扬道德,伸张正气,使人争向善,和睦乡邻,避免争端的作用,曾使镇平县出现了暂时的太平盛世景象。”^{[2](p125)}

表 1 广西荔浦县各息讼分会调解事件统计表(城厢八区)^{[4](p95)}

时 间	第一区	第二区	第三区	第四区	第五区	第六区	第七区	第八区	总计
民国廿一年七月	25	13	14	9	17	13	13	14	118
八月	20	11	15	10	13	13	14	12	108
九月	16	15	12	9	15	11	16	13	107
十月	14	16	13	12	13	14	13	15	110
十一月	18	12	11	14	14	12	12	12	105
十二月	13	13	17	11	12	11	12	12	101
民国廿二年一月	18	16	14	10	11	15	15	16	115
二月	17	18	14	13	14	12	12	13	113
三月	14	12	12	13	12	12	13	12	100
总计	155	126	122	101	121	113	120	119	977

从有限的资料来看,存在以下问题:第一,息讼会并非完全的自治组织,而是被官吏变相把持。广西荔浦县、河南镇平县、江西临川的息讼会的会长、委员、公断员,由县、区、乡镇等地方政府、机关团体的负责人、公职人员担任会长、委员、公断员,公选产生的公断员为少数。第二,各地息讼会章程规定较为粗

略,对于息讼会会长、委员、公断员的产生方式、资格和权限,以及调解范围、组织形式、调解程序、调解协议的效力等均无具体规定。

(二) 调解委员会运行状况

虽然政府积极推动,但由于战争等因素影响,调解委员会的组建并不如人意。如1946年6月14日,内政部致函江西省政府称:

“查乡镇调解委员会组织规程自公布施行以来,迄已数载,各省市县政府已依照规定督促各区乡镇公所成立调解委员会者固多,而以民智未开及种种困难,迄未成立或徒具虚名者亦不少。兹以战事结束,复员伊始,各种民刑事如土地债务婚姻等项纠纷必多,为减少诉讼案件,以期节省人力物力起见,亟应督促各县市政府层令各区乡镇公所,依法成立调解委员会,切实办理民刑事调解事项,并应于事前鼓励区乡镇内具有法律知识之公正人员应选调解委员,由县市政府会同法院召集各委员举行短期讲习会,以利施行而符功令。”^{[10] (p80-81)}

从个别地方,有限的数据来看,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案件量并不多。1946年8月,重庆第十六区调解纠纷6件。1947年,重庆市第十四区调解成立的纠纷8件。1948年,重庆市第十二区调解纠纷10件。1949年5月,重庆市第六区调解纠纷9件。^{[6] (p437)}

(三) 法院调解实效

民国时期,司法机关对法院调解较为重视,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司法行政部曾发布多个训令强调民事案件的调解。1937年4月22日,司法行政部发布训字第二四五二号令:

对于调解事件务须悉心劝导,努力办理,良以两造纠纷果能由调解以终结,不独人民省讼争之累,而法院亦可减案牒之繁,若在经济衰落之区,调解有时尤较裁判为有实益……各该承办人员务须恪遵各种法规及注意事项,努力奉行,各该长官亦宜时时督责,以共体本部使无讼之意。^{[8] (p153)}

1938年5月3日,司法行政部训字第一零三五号训令指出:

经济上已发生急剧变动,睹兹劫后余生,民间之纠纷势必层见叠出,债务人之履行能力亦有重大变化,倘必待起诉后始予解决,则裁判诸多棘手,执行尤感困难,自不如遇事调解以资结束,则收效更宏,嗣后各司法机关办理民事案件务须多方设法,尽力调解,俾双方均得达圆满之目的,而政府使民无讼之意。^{[8] (p154)}

但是,调解情况并不令人满意。第一,法院受理的调解事件数量并不多,占法院受理的案件总数比例很小。如1944—1946年重庆地方法院所受理的民事调解事件占该年度民事案件总数比例极小。(见表2)

表2 1944—1946年度重庆地方法院民事调解事件受理情况表(件)^①

年度	1944	1945	1946
案件总数	7200	6269	5155
调解事件	129	118	84
百分比	1.8	1.9	1.6

第二,调解效果不理想。1943年,司法行政部视察发现“近年各司法机关办理调解事件,调解成立者大都不过百分之几”。^{[8] (p165)}司法行政部认为之所以调解效果不理想,除“当事人固执成见,各趋极端,无法使之归于妥洽”外,“各承办人员对于调解事件之处理未能尽其责亦属重大原因”。^{[8] (p165)}司法行政部对一些法院1943年的调解事件情况调查统计后,发现各地调解效果相差悬殊。如陕西兴平县司法处收受调解事件30件,成立30件。四川犍为地院收受55件,成立55件。三台地院收受962件,成

^① 资料来源《民国卅三年度重庆实验地方法院民事第一审案件总报告表》,《民国卅三年度重庆实验地方法院民事第一审案件总报告表》,《民国卅三年度重庆实验地方法院刑事案件统计表》,重庆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110-3-116、109。说明:重庆地方法院的案件报告总表和统计表中所称“第一审案件”系指法院受理的所有类型的案件。

立 787 件,绵竹地院收受 216 件,成立 202 件。调解成立比例达到 81% 以上。也有一年收件在百件以下而调解成立仅一二件,或者全没有成立的,也有一年收件百件以上,调解成立不到 5% 或 1.9% 的,或者全没有成立的。^{[8] (p170-171)}

从上述有限资料来看,民国时期的息讼会、调解委员会、法院调解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至少在形式上建立较为完备的调解制度,对于纠纷解决有一定作用,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参考文献:

- [1] 龚汝富. 浅议民国时期的民事调解制度及其得失[N]. 光明日报, 2009-05-26(12).
- [2] 郑建银. 镇平县三十年代的息讼会[A].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镇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镇平文史资料第 16 辑政法专辑[C]. 河南镇平: 镇平县印刷厂, 2000.
- [3] 青岛市政府秘书处编印. 青岛市政府行政纪要[M]. 出版地不详, 1933.
- [4] 韦学军. 民国时期的荔浦息讼会[A].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荔浦县委员会文史办. 荔浦文史第 6 辑[C]. 广西荔浦: 荔浦县印刷厂, 1992.
- [5] 河北省政府秘书处第四科公报股. 村息讼会章程. 河北省政府公报[Z]. 1929.
- [6] 周焕强总编. 重庆市志第十四卷[M].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 [7] 湖北省司法行政史志编纂委员会. 处理民事调解应行注意事项(1931 年施行)[A]. 清末民国司法行政史料辑要[C]. 武昌: 出版者不详, 1988.
- [8] 司法行政部. 战时司法纪要. 南京: 司法行政部印, 1948.
- [9] 黄宗智. 经验与理论: 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10] 江西省司法行政志编委会编纂. 江西省司法行政志[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5.

(责任编辑: 戴利朝)

(上接第 148 页)

- [33] 遂川司法处及看守所生活补助费节余及不敷卷[B]. 卷宗号 J018-6-02162, 江西省档案馆.
- [34] 江西战时物价的统计分析: 二十六年一月至三十一年十二月[J]. 江西省政府统计处编印. 江西统计, 1943 (3).
- [35] 杨培新. 旧中国的通货膨胀(增订本)[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 [36] 刘治乾主编. 江西年鉴: 第一回[Z]. 江西省政府统计室, 1936 年 10 月初版.
- [37] 司法行政部、江西高等法院等关于填报公务员及其眷属人数调查表的训令、呈[B]. 卷宗号 J018-1-01413, 江西省档案馆.
- [38] 陈存仁. 银元时代生活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 [39] 王玉茹. 近代中国物价、工资和生活水平研究[M].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7.
- [40] 杨竹生. 崇仁第六区农村经济概况[J]. 经济旬刊, 1935 年第四卷第十八期, 通讯.
- [41] 关于司法院工作报告卷[B]. 卷宗号 J018-8-00270, 江西省档案馆.
- [42] 关于各司法处勘验拘提费的呈[B]. 卷宗号 J018-6-04854, 江西省档案馆.
- [43] 江西高等法院编. 三十六年司法行政检讨会议江西高等法院暨检察处工作报告[R]. 江西高等法院, 1947, 上海市图书馆近代馆藏.
- [44] 黎川县司法处及萍乡、河口、武宁等司法处所属现有员额调查表卷(1948 年)[B]. 卷宗号 J018-01-01441, 江西省档案馆.
- [45] 孟长泳. 吾国司法之检讨[J]. 东方杂志, 1943 (8).
- [46] 安福县司法处审判官、书记官任免卷[B]. 卷宗号 J018-3-00439, 江西省档案馆.
- [47] [美] 本杰明·卡多佐. 司法过程的性质[M]. 苏力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48] 去年上海 86 名法官离职, 司法改革能消解“离职潮”吗? [EB/OL]. <http://shzw.eastday.com/shzw/G/20150420/u1ai147926.html> 东方网, 2015 年 11 月 11 日.

(责任编辑: 戴利朝)